評析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觀點

郭 雪 眞
(陸軍官校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國際系統的理論化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關鍵階段之一，甚至有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如同是（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傳統。國際關係學者從1950、60年代開始進行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嘗試建立科學研究的國際系統理論，不同的學者都嘗試藉由其他學科學者的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提出不同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歷經三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第一階段引述歷史社會學學者的國際系統觀點，作為其國際系統理論化及批判新現實主義國際系統理論化的主張。強調國際系絡或國際系統的國家形成與發展，尤其是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的歷史社會關係。其國際系統觀點是以國家系統（systems of states）而非單純的國家之間的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s）為基礎。第二階段則是強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本身的途徑，其理論化強調國際系統及國家的歷史偶然性、結構與單元的多樣性及與系統的動態關聯性，以及結構與行為者之間的相互組成及自主性，並且以「全球結構」與「世界社會」取代「國際系統」。近來的第三階段運用「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理論化國際系統，認為國際系統是一個鑲嵌在物理（自然、物質）系統及社會（理念）系統之內的複雜調適系統，具有自我組織、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國際系統的模式（無政府或層級）及規律（秩序）就是從系統單元的行動而具體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帶來更為多元的觀點，其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在方法論上仍有所啟示與省思。

關鍵詞：國際系統、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歷史社會學、複雜理論、國際系統理論化

* * *

壹、前　言

國際關係學者受到政治學行爲主義革命（behavioralism revolution）的影響，①而引用「系統」概念作爲理論化「國際關係（政治）」的概念，如同政治學者以「系統」理論化「政治」一樣，②藉以解釋國家行爲受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及國際環境的相互影響，也就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提及的「第二次大辯論」（the Second Great Debate）中的科學派提出的以「系統理論」概念化及理論化國際關係。③隨著此大辯論的流行，無論是同意或反對科學派觀點，「國際系統」一詞已經成爲通用的名詞，藉以說明解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對國家之間互動關係的影響。精確地說，就是「國際系統」的理論化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關鍵階段之一，甚至有學者認爲國際關係（研究）如同是（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傳統。④國際系統是指構成國際（the international）的國家之間（inter-states）的相互關係，包括整個系統關係（即國際系統）及構成此關係的元素（即國家、非國家、個體等）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它仍是擴大原有的「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一詞所指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到非國家行爲者的「國際關係」。⑤遂有些國際關係學者引進聚焦人類社會複雜結構長期變遷過程的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意圖探索國際系統（或世界系統或全球系統）此複雜結構的長期變遷過程，賦予國際系統歷史性與社會性。⑥進而出現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理論，⑦提供不同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及途徑。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歷經三波發展而逐漸成爲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另類研究途徑，成爲強調歷史社會結構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⑧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爲脫離以

註①　有關政治學的行爲主義革命，參閱 Heinz Eulau, ed., *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thertn, 1969)；對行爲主義的批評，參閱 Charles A. McCoy and John Playford, eds., *Apolitical Politics: A Critique of Behaviorali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7).

註②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註③　Inanna Hamati-Ataya, "Behavioralism," in Robert A. Denemark and Renée Marlin-Bennett, ed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Onlin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http://www.academia.edu/593814/Behavioralism>, 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3 日。

註④　Mathias Albert and Lars-Erik Cederman, "Introduction: Systems Theorzing in IR,"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7.

註⑤　這是「國際關係」一詞存在的本體論爭論，無法望文生義只指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註⑥　郭雪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63~64。

註⑦　也有以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及 Sociology of State-Systems 稱述。

註⑧　有關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參閱余家哲、李政鴻，「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40 期（2009 年 6 月），頁 127~152；汪宏倫，「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11 年），頁 259~286；郭雪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頁 63~96。

歐洲爲中心的非歷史主義，遂強調以世界歷史或新全球歷史作爲其歷史理論，尤其是第二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迫使國際關係學者重新思考現代國際系統及主要行爲者行爲的特定獨特的社會起源。⑨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帶來更爲多元的觀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方式與貢獻，殊值研究與探索，尤其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依循著歷史社會學對於建立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或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的因果解釋爭論，歷史社會學所提供的歷史社會解釋是理論導向（theory driven）或問題導向（problem driven）也影響到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其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較爲強調國際系統的歷史性，因爲其認爲國際關係本身是具有強烈的歷史關聯性（connected histories），應重新恢復原有的歷史性；並以社會互動系統看待國際系統，強調國際系統的複雜性。

在歷經三波發展而成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過程中，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也以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發展其獨特的國際系統觀點，⑩第一階段引述歷史社會學學者的國際系統觀點，作爲其國際系統理論化及批判新現實主義國際系統理論化的主張。其國際系統觀點是以國家系統（systems of states）而非單純的國家之間的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s）爲基礎，強調在國際系絡或國際系統的國家形成與發展，尤其是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的歷史社會關係。第二階段則是強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本身的途徑，強調國際系統及國家的歷史偶然性、結構與單元的多樣性及與系統的動態關聯性，以及結構與行爲主體之間的相互組成及自主性，並且以「全球結構」與「世界社會」取代「國際系統」。近來的第三階段是運用「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認爲國際系統是一個鑲嵌在物理（自然、物質）系統及社會（理念）系統之內的複雜調適系統，具有自我組織、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國際系統的模式（無政府或層級）及規律（秩序）就是從系統單元的行動而具體化。

本文主旨在於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於「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基本概念，以及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歷程，並且比較其間差異，以及其對理論化國際系統的啓示與省思。尤其第三階段的國際系統是否會帶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第四波發展呢？或是呈現出「均衡系統」與「非均衡系統」的論證呢？

本文首先論述國際關係研究對於「國際系統」的重視，以及若干國際系統的基本概念與觀點。第二，探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的第一階段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即是以傳統的歷史社會學觀點作爲途徑。第三，探索第二階段以國際歷史社會學強調的歷史性及系統性作爲途徑。第四，探索第三階段以複雜理論作爲途徑。第五，比較分析其三階段的途徑，並提出個人的評論。最後，從整體方法論觀點評論歷史社會

註⑨ John M. Hobson,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414~430.

註⑩ 必須說明這三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只是說明時間先後而非接續取代，當第二階段出現時，第一階段依然存在；當第三階段出現時，這第一、第二及第三階段是共同存在的。

學，進而評析國際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觀點所帶來的啓示與省思。

貳、國際系統的理論化

從 1950、60 年代開始進行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嘗試建立科學研究的國際關係理論，不同的學者都嘗試藉由其他學科（例如社會學、生物學、控制學）學者的系統理論提出不同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11]例如 Morton Kaplan 以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認爲國際系統是行動的社會系統，強調系統構成原則與權力分配而形成六種不同類型的國際系統，以解釋與預測國際政治。[12]新現實主義者 Kenneth Waltz 也是以一般系統理論（但強調政治系統）理論化國際系統，特別強調國際系統的物質結構，以及國家在國際系統的位置。[13]自此，國際系統的理論化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都必須探討及理論化國際系統，國際系統的理論化也形成各學派內部及之間的差異。

基本上，系統原是個生物學的分析概念，用以描述生物之間及其與環境之間關聯性（interconnections）的概念。引入國際關係研究國家之間及其與國際環境而爲國際系統，國際系統即是假定其構成元素或單元之間、元素或單元與系統之間及系統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性，關注的焦點就在於此系統的性質、各構成元素及其之間的性質與界線、系統與各構成元素及環境之間的性質與界線，以及整個系統的均衡、穩定與變遷。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即是在於建構對此相互關聯性的關注焦點之論述，以作爲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假定或是本體論基礎，例如國際系統的狀態（無秩序或秩序、均衡或非均衡、有機或無機、開放或封閉等等）、結構（單極、二極或多極權力；單一、二元或多元層級；層級位置；分殊化程度；系統與次系統關聯性；物質或理念結構等等）、維持與變遷（行爲主體或結構、部分或整體、適應或轉型等等）。從事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學者是假定了國際系統對國際現象的影響，國際系統層次的變數（例如結構、互動能力、文化）解釋了國際互動現象與國家行爲，也就是國際系統變數是國際互動現象變遷的原因而不是結果，國際系統變遷與其內部變遷也是如此。也就是國際系統層次的變數或變遷過程不能化約成國際系統內的各單元、各部分（sectors）或各次系統（subsystems）的屬性及之間的互動，以及與整個系統的互動過程。

Brian C. Schmidt 甚至以「(國際系統）無政府的政治論述」(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說明美國國際關係學科的歷史發展，即是研究在國際系統無政府世界的政治互動。[14]換言之，也就是各理論學派對於國際系統（無政府）、各單元（國家與非國家行爲者）與國際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的不同理論化觀點。即使如此，國際系統仍是

註 11　「國際系統」一詞就是從系統理論引介而來，用以稱述原有的「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

註 12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註 1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註 14　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一個低度發展的概念（underdeveloped conception）或是深陷爭辯的（deeply contested）概念，存在著現在主義（presentism）、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傾向主義（anarchophilia）及國家中心主義等問題，已經成爲國際關係學科的「緊身拘束衣」（Procrustean straitjacket）限制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⑮簡言之，各個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系統都假定了特定的性質，致使國際關係學者對此概念的定義仍未有所共識，遑論對此概念的理論化，反而是其理論化區別出各理論學派之間的基本差異。例如現實主義理論假定了國際系統無政府的客觀存在性質及現在性質，建構主義理論則假定國際系統無政府的相互主觀存在性質，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假定國際系統的歷史社會性質。由於這些假定是難以驗證眞僞，只是作爲其理論化國際系統的推論基礎，從其推論中而呈現各理論的差異。

本質上，系統（system）是一個分析概念，並非實質存在的客體，稱之爲國際系統即是假定國際關係的構成元素之間及其與系統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性，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此系統的性質、各構成元素及其之間的性質與界線、系統與各構成元素之間的性質與界線，以及整個系統的均衡、穩定與變遷。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即是在於建構對此相互關聯性的關注焦點之論述，作爲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假定或是本體論基礎，例如國際系統的狀態（無秩序或秩序、均衡或非均衡）、結構（單極、二極或多極權力；單一、二元或多元層級；系統與次系統關聯性；物質或理念結構）、變遷（行爲主體或結構、部分或整體）。從事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學者是假定了國際系統對國際現象的影響，國際系統層次的變數（例如結構、互動能力、文化）解釋了國際現象與國家行爲，也就是國際系統變數是國際現象變遷的原因而不是結果，國際系統變遷與其內部變遷也是如此。也就是國際系統層次的變數或變遷過程不能化約成國際系統內的各單元（units）、各部分（sectors）或各次系統（subsystems）的屬性及之間的互動，以及與整個系統的互動過程。但這樣的觀點，則會因學者而有不同。例如 Waltz 就認爲國際系統的結構決定了次系統（國家）的互動，Alexander Wendt 則認爲次系統（國家）的互動可以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⑯差別就在前者強調物質結構，後者強調理念結構，行爲主體（國家）之間的互動在前者是受到限制而無法改變結構，在後者則是有可能改變結構。這並非絕對的觀點，而是相對的觀點。

簡言之，這涉及到分析層次（levels of analysis）或結構與行爲主體（structure and agency）的問題，它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或整體主義（holism），但此互動過程顯示出國際關係各理論學派國際系統理論化的觀點。當然，反對或不強調國際系統層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則是強調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主張行爲主體

註⑮ 「緊身拘束衣」是醫院用來穿在情緒激動的病人身上，以限制其行動的衣服，隱喻著國際系統概念沒有共同定義或假定，限制了國際關係理論發展。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22.

註⑯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gents）的個體層次（領導者、國家、國際組織等）對國際系統的影響。無論如何，國際關係理論都必須觸及國際系統的理論化過程，只是選擇的分析層次有所不同而已，進而產生不同的理論化推論過程。

要理論化國際系統涉及到兩個部分，一個是針對國際系統實務的理論化，也就是對於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行爲者及兩者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進行理論化，這是所有國際關係理論都會進行的論述，「國際系統」一詞等同於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另一個是以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 or Systemism）⑰爲理論化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強調國際系統的組成、性質、結構、穩定與變遷，常被稱爲是「國際系統理論」（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o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例如 Morton Kaplan 的現實主義、⑱ Kenneth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⑲ Barry Buzan 的結構現實主義⑳及 Alexander Wendt 的建構主義㉑或是 Mathias Albert 及其他學者引用德國社會學者 Niklas Luhmann 的現代系統理論（modern systems theory），將國際系統視爲是世界社會系統，其中溝通形成此社會系統的基本運作，而能藉由系統內在的分殊化（internal differentiation）達成此世界社會的完整（unity）㉒等等，國際系統理論是以「國際系統」爲基本的理論概念（conception），所差異的是不同的概念化或理論化觀點。一般而言，後者常是涵蓋了前者，即是國際系統概念的理論化涵蓋了實務的理論化，但國際系統實務的理論化並不一定涵蓋了國際系統概念的理論化。這在各個國際關係理論中是常常出現的差異，例如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與 John Mearsheirmer 的攻勢守勢現實主義，前者關注國際系統概念的理論化，後者則是關注國際系統實務的理論化。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觀點也是屬於「國際系統理論」，但較爲強調國際系統的歷史性，因爲其認爲國際關係本身是具有強烈的歷史性，應重新恢復原有的歷史性。㉓藉由關注現代國際系統的敘事史而能重新恢復此過程中動態的社會內涵，沒有

註⑰　有關系統理論的深入、綜合闡述，參閱 Andres Pickel, “Rethinking Systems Theory: A Programmatic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37, No. 4（2007）, pp. 391~407.

註⑱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⑲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⑳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㉑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㉒　Mathias Albert,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3~68; Hans-Martin Jaeger,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a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pp. 69~96; Mathias Albert and Lena Hilkermeier,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Routledge, 2004）; Stephan Stetter, ed., *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World Society: Modern System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07）.

註㉓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Hobson and George Lawson,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37, No. 2（2008）, pp. 415~435; George Lawson, “The Eternal Divid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2（2010）, pp. 203~226.

此內涵就無法探知此過程的眞相。[24]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遂重視國際系統對國際社會發展的影響史，國際系統成爲其分析國際社會世界的核心變數，以歷史證據觀察國際系統的長期社會發展。簡言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認爲國際系統或國家系統是鑲嵌在國際社會的歷史過程之中，國家與國際系統的形成、之間的關係及整個變遷都是長期歷史發展的影響。其對國際系統的理論化主要就是歷史化（historicize）國際系統，這是不同於其他的「國際系統理論」。這是因爲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批評國際關係理論的「非歷史主義」（ahistoricism），也就是「現時崇拜主義」（chronofetishism）與「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rism），前者指涉現在（present）只能以檢視現在而適當地解釋，可以忽略過去；後者指涉理論者以前者觀點看待歷史，歷史時段是不連續且有差異。總之，就是有「歷史恐慌症」（historophobic）。[25]意思是說，在時間上，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只是關注現在，不在乎現在是由過去所發展而來的，卻又要以此方式看待整個歷史而尋求預測未來。若是要以現在預測未來，則又必須追溯過去，這涉及到必須廣泛涉獵歷史資料，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這是令其恐慌的。因此，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聚焦於歷史社會觀點，以歷史理論及社會（系統）理論建構其國際系統理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遂歷經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歷程，嘗試建立其獨特的理論化途徑，彰顯其不同於其他理論的特色。尤其是第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是否能帶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第四波發展，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參、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一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傳統歷史社會學的途徑

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是不同於其它的理論學派，既不同於一般（社會）系統理論也不同於非均衡的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理論，其強調歷史社會結構的觀點，賦予國際系統理論化歷史社會的意涵，以及契合國際系統理論化的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或整體主義。誠如 John M. Hobson 所言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在質疑（problematising）無政府下的「相似單元（國家）」（like-units）意涵、獨特自我構成的國際領域意涵、單元之間的空間分殊化、無政府像是一個分殊化的結構、系統之間（inter-systemic）及社會之間（inter-societal）的關係等議題，提供了洞察見解成功進入具有正當性的國際關係研究（legitimate

---

註[24] Justin Rosenberg, “The International Imagination: IR Theory and ‘Classic Social Analysis’,” *Millennium*, Vol. 23, No. 1（1994）, p. 103.

註[25]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quiry)。㉖簡言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質疑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國際系統、國家與社會之間互動的議題，並賦予其歷史性而能理解國際系統的變遷過程。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遂以社會學歷史社會學作爲理論化國際系統的途徑，但由於所選擇的社會學歷史社會學者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理論化過程，但主要的歷史社會學者仍是 Michael Mann、Charles Tilly、Theda Skocpol 及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基本上分爲派森斯派（Parsonsian）、韋伯派（Weberian）及馬克思派（Marxian）三個理論脈絡，主要是在美國及英國的社會學界發展而擴展到國際關係學界。㉗ Justin Rosenberg 起初是仿傚 Charles W. Mills 的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一書，以「國際想像」（*The International Imagination*）說明國際關係理論的社會學想像，作爲改正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非歷史主義，即是藉以強化國際（關係）系統理論的歷史化。包括以現代世界史的眞正國際系統爲研究客體、關注歷史及現代國際系統的敘事史、以個體之間眞實歷史關係的（複雜但可認知的）整體性理解社會世界及國際系統，以及藉由釐清所涉及的眞實人類關係而教導道德選擇。㉘實際上，Rosenberg 的「國際想像」就是要引介歷史社會學理論進入國際關係研究。適逢國際理論研究轉向社會學與歷史的雙重轉向（a double turn），提供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富饒的茁壯土地，㉙或更清楚地說是「歷史社會學轉向」，㉚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成爲國際關係理論的一種少數、邊緣或另類的觀點。

依據 Justin Rosenberg 的說法，國際歷史社會學的概念架構是從以各社會的關係結構作爲解釋開始進行，有系統地吸納這些社會的不同時（asynchronous）互動之因果顯著性，成爲這些社會隨著時間的個別及集體發展與變遷之解釋。㉛換言之，就是從各社會的關係結構開始探索各社會之間的互動，以解釋這些社會個別及集體的歷史變遷。只是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性」（the international）指涉的是社會之間而非國家之間，跳脫了社會學歷史社會學者所指涉的國家中心主義。雖然 Stephen Hobden 說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學者與歷史社會學的總體社會學者之間的界線正在瓦解之中，㉜但還是有必要區分出兩者之間的差異，藉以呈現國際關係歷史學者的觀點。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 Stephen Hobden 嘗試評論國際關係常引述的歷史社會學者 Theda Skocpol、Charles Tilly、Michael Mann 及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不同的觀

註㉖　Ibid., pp. 14~19.

註㉗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New York: Routledge, 1998）; Gurminder K. Bhambra,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nected Histor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1（2010）, pp. 127~143.

註㉘　Justin Rosenberg, "The International Imagination: IR Theory and 'Classic Social Analysis'," pp. 85~108.

註㉙　George Law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Forum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2007）, pp 341~342

註㉚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

註㉛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2006）, p. 355.

註㉜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p. 196.

點，作爲其國際系統理論化的主張。他指出前三者的國際系統概念是含混且理論化不足的（under-theorised），各有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提出多重說明但未能探討每個解釋中的影響因素相互關聯）及不相容（從系統元素提供的不同說明之間不相容）的元素，並且深深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㉝ Hobden 認爲 Skocpol 混合了經濟的、政治的及時間的（temporal）特質理論化國際系統，但探討歷史物質時（historical material），則將國際系統化約成戰爭（warfare）的有無。㉞ Hobden 認爲 Tilly 強調戰爭與國際系統的關聯，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國際系統的影響是重要的因素，而且國際系統是被做出來的（made），國際系統是戰爭的結果，也是限制國家行動的規則與規範所構成的網（webs）。㉟ Hobden 認爲 Mann 視國際系統是社會行爲者的創作（creation），包括政治人物的想法及理性行爲者的計算，他也和 Tilly 一樣，運用戰爭解釋歐洲國家的成長，因爲戰爭而來的稅賦負擔造成國內的階級鬥爭及政治系統的改變，並且規範和規則限制了國家。㊱ Hobden 認爲 Wallerstein 的現代世界系統（Modern World-System）不同於前三者且沒有其缺點，而是具備時間（依時期長短而分循環旋律、世俗趨勢、矛盾與危機）及空間的面向（國家在世界經濟層級的位置而有中心、邊陲及半邊陲國家之別），現代世界的一切主要制度（如階級、族裔、國家）都是此系統的產物，國家的經濟位置決定了其強弱。但這些歷史社會學者成功地產生一個對國家發展的歷史說明，即是國家是歷史的偶然（contingent），國家形式的改變是與其他國家關係及不同社會行爲者之結果。簡言之，歷史社會學者視國際系統是構成國內發展的原因變數。㊲最後，Hobden 參考了 Mann 的多重邏輯觀點及 Barry Buzen、Charles Johns 和 Richard Little 的「部門分析途徑」（sectoral approach）提出其理論化國際系統的途徑，即是強調國際系統及國家的歷史偶然性、結構與單元的多樣性及與系統的動態關聯性，以及結構與行爲者之間的相互組成及自主性，並且以「全球結構」取代「國際系統」。㊳總之，Hobden 認爲 Skocpol、Tilly 和 Mann 三人過於強調釐清國家概念而使其國際系統概念含混不清，即是在國家與國際系統之間的歷史動態過程。

Daniel Nexon 則是認爲 Hobden 並未詳細關注這四位歷史社會學者的理論假定及方法，尤其是 Tilly 和 Mann 的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或關係社會學（relational sociology），即是以傳動（transaction）模式爲（歷史）社會理論的起點，強調社會關係的過程或網絡，而且兩人也未接受 Hobden 所假定的結構與規範、結構與行爲主體、理性行爲者與社會行爲主體性的區分。Nixon 認爲這些區分只是分析的性質，而且 Mann 和 Tilly 都反對這樣的分析架構，Hobden 只是希望維持結構與行爲主體的相互構

註㉝ Stephen Hobden,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erspectives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2（1999）, p. 258; pp. 263~266.

註㉞ Ibid., pp. 259~260.

註㉟ Ibid., pp. 260~261.

註㊱ Ibid., pp. 261~262.

註㊲ Ibid., pp. 262~263.

註㊳ Ibid., pp. 269~270.

成，並且也不希望犧牲了結構與行爲主體各自的自主性，那他就需要界定此分析二分法及知識論二分法的效用了。㊴ Hobden 則回應他主要的批評是這些歷史社會學者在國際層次未能如其在國內層次成功地將社會關係予以歷史化，但這些學者仍有國家形成的歷史化、國際系統變遷的理論化及拒絕國際與國內二分法等貢獻。其次，Habden 認爲 Nixon 以新功能主義及關係主義的二分法區分這些學者，進而批評他是新功能主義而反對 Tilly 和 Mann 的關係主義，要他在其中做出選擇。他回應指出他不會使用新功能主義此詞，因爲它在不同學科會有不同的意思，Hobden 改以實質元素主義（substantionalism）取代新功能主義。而且他也沒有反對關係主義，因爲關係是理解社會世界的核心，社會理論化的歷史研究途徑必須是關係的，必須分析社會行爲者之間的關係。但實質元素主義與關係主義不是二分法是光譜，他較接近前者而 Nixon 較接近後者，甚至 Nixon 也同意兩者之間也分享了許多的本體論假定。何況，Tilly 和 Mann 也未使用關係主義此詞，兩人實際也不是關係社會學者。最後，關於批評這些學者受到現實主義影響方面，Hobden 認爲他不是說這些學者承諾現實主義而是他們以軍事衝突作爲國家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力，藉以概念化國際關係。軍事衝突只是國際關係的一個層面，研究國際關係需要是多層面的。㊵

從兩人的爭論中（見**表 1**），仍可發現傳統歷史社會學者在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國際系統理論化的影響力，也可發現學者意圖從中尋求在國際層次（領域）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雖然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引述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學者的國際系統觀點，作爲其國際系統理論化的主張。㊶但是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學者對於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常是聚焦於國際系統對於國內系統（例如國家形成、發展、社會結構）的影響，尤其是戰爭對國內系統的影響，並以國內類比（domestic analogy）方式理論化國際系統，過於強調國家在國際系統結構的限制角色。而且不同的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學者對於國際系統的理論化也有不同，這主要是涉及到對於「國際性」與「系統」的理論化，包括對於國際系統的界定、構成、結構、單元，以及之間的關係。相較於此，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就較爲強調國際系統的操作化與歷史化，其藉由系統理論與歷史理論進行國際系統的理論化。

註㊴　Daniel Nexon, “Which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sponse to Stephen Hobden’s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2001）, pp. 273~280.

註㊵　Stephen Hobden, “You Can Choose Your Sociology but You can’t Choose Your Relations: Tilly, Mann and Rel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2001）, pp. 281~286.

註㊶　首推 Fred Halli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Agenda,” *Millennium*, Vol. 16, No. 2（1987）, pp. 215~230; Anthony Jarvis, “Societies, States, and Geopolitics: Challenges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3（1989）, pp. 281~293.

表 1 Stephen Hobden 與 Daniel Nexon 的爭論對話

歷史社會學者	Hobden的批評	Nexon的評論	Hobden的回應
Theda Skocpol	以經濟、政治時間的特質理論化，化約成戰爭的有無。	1.Hobden並未詳細關注這四位歷史社會學者的理論假定及方法，Tilly和Mann是關係主義或關係社會學強調社會關係的過程或網絡。 2.Hobden是以自己假定區分爲分析。 3.他們不是現實主義者。	1.他們在國際層次未能如其在國內層次成功地將社會關係予以歷史化，但仍有貢獻。 2.他較接近實質元素主義，Nexon較接近關係主義。 3.Tilly和Mann不是關係社會學者。 4.他們以軍事衝突作爲國家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力，藉以概念化國際關係。
Charles Tilly	是被做出來的，化約成戰爭的結果，也是限制國家行動的網。		
Michael Mann	是社會行爲者的創作，戰爭限制了國家。		
Immanuel Wallerstein	沒有缺點 具備時間與空間		
整體前三人	國際系統概念是含混且理論化不足的，各有不同程度的不一致及不相容的元素，並且深深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途徑

國際關係歷史社學者爲突破第一階段以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爲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遂強調以系統理論與歷史理論作爲其建立「國際性」的理論化途徑。就系統理論而言，也就是如何概念化與理論化「國際系統」，稱爲新韋伯派國際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的國際系統觀點是以國家系統（system of states）或社會系統（system of societies）而非單純的國家之間的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s）爲基礎。國際關係理論多以假定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是在沒有高於主權國家的權威下，即是無政府的國際系統。無論是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將此假定視爲客觀的既定事實，國際系統存在於國家之間的權力分布結構，國際系統先於國家存在；[42]或是建構主義將此假定視爲是相互主觀的社會事實，國際系統或國家系統存在於國家相互關聯的理念分布（distributions of ideas）結構而定，國家先於國際系統存在。[43]這些理論藉由這樣的假定作爲其理論邏輯推理的前提，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則是認爲國家系統是歷史社會事實（historical-social fact），是人類社會歷史變遷過程的事實。不同於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強調於國家的形成與發展，[44]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更強調在國際系絡或國際系統

註[4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4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44]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的國家或社會形成與發展，尤其是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以及國家在其中的關係。例如 Kamran Martin 研究伊朗的前現代國家形成㊺或是 John M. Hobson 和 J. C. Sharman 研究國際系統內次系統（國家）形成層級結構（hierarchy）的變遷史，㊻都強調國際系統是歷史社會事實。簡言之，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都是整體社會歷史發展的部分，是不能分隔的。

這關係就涉及到「國際性問題」（the problematic of the international），㊼此問題決定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否存在，㊽也正是第三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中所要處理的重要議題，已經獲得若干程度的解決。㊾ Hobson 以雙元反思性（dual-reflexivity）表達國際領域與國內領域之間相互構成或形塑的關係，不僅相互影響也相互結構。即是「由國際到國內再回到國際」（international-national-international）的一種空間三位一體（spatial trinity）的因果鏈（casual chain）關係。㊿簡單地說，從國際到國內是一元反思，再從國內回到國際是雙元反思，兩者是互爲因果的影響關係。對國家而言，國際結構與國內結構既是機會領域也是限制領域，因爲國家是具有雙面特性的實體（a spatially Janus-faced entity），同時面對國際（全球）與國內領域，這使其能在不同的領域及權力來源施展，以增強其多重利益，轉而造成國內及國際領域的變遷。(51)這也就是 Fred Halliday 所稱的國際與國內的「互動鏈」（interactive chain）。(52)簡單地說，國際影響國家，國家又影響了國際，只是這相互影響是歷史偶然而不是必然。這顯示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不同於歷史社會學或是以跨地理區域或跨國家比較的「比較歷史社會學」（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強調的就是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

另外，也有不是從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關係探討，而是從兩者混合發展的結果理論化「國際性」。例如 Justin Rosenberg 以「不均衡且混合的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擴展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的結合，此現象是由於國際資本主義

註㊺　Kamran Marti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World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formation in Premodern Ir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2007）, pp. 419~433.

註㊻　John M. Hobson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2005）, pp. 63~98.

註㊼　這是 Justin Rosenberg 的用語，但主要是說明 Robert Walker 的理論貢獻，參閱 Justin Rosenberg, *The Follies of Globalisation Theory*（London: Verso, 2000）, p. 65.

註㊽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07~340.

註㊾　參閱郭雪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頁 73~75。

註㊿　John M. Hobson,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16; John M. Hobso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tate and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1988）, pp. 284~320.

註(51)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0.

註(52)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p. 140.

施壓於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內在發展的結果，更可以探索前現代與現代的國家社會關係，發展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性」[53] Sebastien Rioux 則批評此概念未能說明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發展的社會歷史因果性，[54]但 John Glenn 則爲此概念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持續演進，以及其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整體變遷。[55]此方式正是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三波發展中重要的「國際性」理論化概念，似乎有將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從新韋伯派轉向馬克思派或新托洛斯基派的意味。[56]但這在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而言，這是屬於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的範疇，因爲仍是屬於均衡系統的理論化途徑。

簡言之，對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來說，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必須關注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的關係，以強化其「國際性」成爲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而不是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就歷史理論而言，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質疑新現實主義現代國際系統理論化的「非歷史主義」，即是「現時崇拜主義」與「現時中心主義」。Hendrik Spruyt 並不同意社會學歷史社會學者主張戰爭造成主權國家的興起，尤其是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造成現代主權國家或國際系統的興起，而是中世紀（Middle Ages）興盛的貿易造成舊有的政治組織（封建主義、帝國、教會）難以適應所需，出現各種競爭的新政治組織，其中出現在法國的主權國家勝過了漢薩同盟的（Hanseatic）城市聯盟及義大利的城市國家，最能適應貿易帶來的變遷，成爲國際系統主要的政治組織。[57]簡言之，貿易需要有競爭力的新政治組織或制度（主權國家），進而帶動了國際系統的變遷。另外，Benno Teschke 以社會資產理論（social property theory）理論化國際系統，藉以解釋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n）系統的變遷是植基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資產關係，質疑現代國際關係奠基於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協議的國際系統，而是現代國際系統源自資本主義農業資產政權的英格蘭（England），以及後續大不列顛王國（British）的建立及殖民改變了國際系統，也就是從絕對君王主義變遷到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國際）系統。[58]這些國際系統的變遷是有其歷史性的社會結構因素，例如戰爭或社會資產關係，由國際系統或國內系統的歷史社會系絡所相互作用的。

最能呈現第二階段特色（國際性、系統論與歷史論）的著作之一，是 Hendrik

註[53]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07~340.

註[54] Sebastien Rioux,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Recovering Sociohistorical Causality,”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4（2009）, pp. 585~604.

註[55] John Glen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 Fusion of Marxism and Structural Re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2012）, pp. 75~95.

註[56] 郭雪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頁 63~96。

註[57]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s and Its Competitor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ndrik Spruyt,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 Anarchy as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4（1994）, pp. 527~557.

註[58] Benno Teschke, “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lutism to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1（2002）, pp. 5~48.

Spruyt 以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對比新現實主義的國際系統理論化，呈現歷史社會學的洞見。他認爲 Kenneth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以演繹地操作化國際系統結構以解釋個體單位（國家）的行爲，即是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本質決定了國際系統構成元素（國家）的功能同質性，權力的不均衡分配決定了國際系統構成元素（國家）的行爲。這樣稀疏的演繹分析國家行爲是不充足且錯誤，而且是以現代的國際系統（主權、領土國家）爲理解基礎，忽略構成國際系統的單元性質及類型。他並指出歷史社會學藉由歷史化國際（國家）系統就能理解國際領域與國內領域的區分是現代的現象，前現代時兩者是重疊的，無政府狀態是歷史偶然，不能視爲理所當然的假定前提。其次，認爲單元與系統之間是相互牽扯（mutually implicating）的關係，而不是系統決定了單元。最後，系統與結構只有在行爲者的自我理解中才有意義。他進而提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研究綱領，包括更清楚的國際系統分類、釐清多層面權力資源的組成與主導，以及釐清國際系統組成單元的安排。[59]這樣的觀點徹底解決了 Waltz 物質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而且其主張系統與結構只有在行爲者的自我理解中才有意義，這似乎也蘊含著 Alexander Wendt 理念結構論的觀點。無論如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針對國際系統的理論化，已經從國際系統的「歷史社會性」、「國際性」而到了國際系統本身了。

換言之，國際系統理論觀點的焦點應該置於系統論，歷史社會論已經不是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國際系統理論化的重要議題了，因爲其歷經二十多年的努力，國際系統的歷史社會性已是其理論特色了。John M. Hobson 更指出第二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正朝向「複雜的」國家理論（a complex theory of state），其一般理論架構是轉向「複雜性」（complexity），即是研究國內與國際變遷的、權力來源的多因果性、空間層次（次國家、國家、國際及全球）相互組成及鑲嵌的多空間性、權力來源與行爲者（國家或階級）的部分自主性而有多重的認同身分及本質、歷史與變遷的複雜意涵（突然隨機不連續的歷史觀），以及非現實主義論的國家自主性與權力（國際系統結構組成國家，國家也組成國際結構）。[60]這觀點促使了某些學者嘗試以「複雜理論」作爲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三階段理論化國際系統的基礎，使其更具「複雜性」和動態性。但就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三波發展過程而言，第二波是新韋伯派歷史社會學，第三波是新托洛斯基派歷史社會學，這兩波是在發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性」，Hobson 所指的第二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應該可以算是另一波（第四波）了，即是從社會系統而到自然系統，以非均衡的系統理論發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

註 [59]　Hendrik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1998）, pp. 340~353.

註 [60]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2~198.

伍、第三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複雜理論的途徑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為強化其國際系統理論觀點，除了延續既有的社會系統論外，也開始引用自然系統論作為其國際系統論的觀點。隨著複雜理論被引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61]而有了「複雜國際關係理論」(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或「複雜化的國際關係研究」(Complexif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稱呼。[62]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也運用「複雜理論」理論化國際系統，複雜理論藉由「突現」(emergence)、自我組織與「複雜調適系統」(a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等概念處理不同系統層次的多重行為者互動的結構內元素、系統與環境的相互關聯性。系統屬性是源自各組成單元關係及互動的時間變化，整體系統是多過各組成單元 (或部分) 的總合，不能將整體系統分解成各組成單元理解國際系統的動態及屬性，但各組成單位仍能自主存在，整體與單元 (或部分) 是以互惠因果性相互共同組成。同時，系統內元素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相互關聯性。[63]

當 Hobson 認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轉向「複雜性」時，認為國際系統是一個鑲嵌在物理 (自然、物質) 系統及社會 (理念) 系統之內的複雜調適系統，具有自我組織、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國際系統的模式 (無政府或層級) 及規律 (秩序) 就是從系統單元的行動而具體化，也由於國際系統是個自我組織系統、具有突現的特性 (emergent properties) 如與制度結構有關的規範、規則及組織，與系統關係有關的極性與特質、不同的宰制、剝削及排除型式、中心與邊陲，與非線性有關的分枝 (bifurcation) 觀點、回饋機制及 (初始條件) 敏感性，國際系統是個動態的、非線性系統的，並且難以預測的系統。[64]尤其是複雜理論重新聚焦於關係的及反本質的社會本體論、過程及關係，[65]使國際關係研究從「牛頓科學的沉睡」(deep Newtonian

---

註 [61]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Lars-Erik Cederman,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pp. 127~157; Bear F. Braumoeller,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pp. 158~191.

註 [62]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p. 435~454; Emilian Kavalski, "Waking IR from Its 'Deep Newtonian Slumber," *Millennium*, Vol. 41, No. 1 (2012), pp. 137~150.

註 [63]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註 [64]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 *Millennium*, Vol. 39, No. 2 (2010), pp. 399~416.

註 [65]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7~50.

slumber）中醒來，即是脫離線性、秩序的封閉系統觀點，[66]以「後牛頓科學」（post-Newtonian）及「非以人類爲中心」（non-anthropocentric）的途徑研究國際關係中的結構與行爲主體之關係，強調國際系統在此關係的作用，包括人類系統（例如國際組織、國家、個人）與非人類系統（例如氣候）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每個行爲主體都是差異化的（differentiated），其行爲主體性在國際政治上是可能的，並超越既有以人類系統爲主的國際關係（系統）而能以複雜系統或後人類（posthuman）系統思考國際關係。[67]即是藉由結合複雜理論與生態主義（ecologism）而成的「複雜生態主義」（complex ecologism）發展出「後人類國際關係」（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及整個自然世界，不再是以人類爲國際系統理論化的中心。[68]

簡言之，國際系統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系統了，而是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相互鏈結、相互演化的系統了，各系統之間的複雜互動在適應複雜的環境，並且帶來各自系統及整個國際系統的變遷。這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途徑更加精緻，國際系統不再是人類歷史社會的事實，而是涵蓋了非人類選擇的因素，國際系統是共同演化的結果。這也就是國際歷史社會學所強調的歷史偶然性，藉由複雜理論更清楚地說明了此歷史偶然性。這樣的觀點是截然不同於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三波發展，是否會引發第四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的產生與發展，目前言之過早，仍有待觀察新著作的出現。

誠如 Neil E. Harrison 和 J. David Singer 所認爲的，複雜理論不只是個系統理論，它修正了系統理論在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不足，並且納入其它的理論。[69]尤其複雜理論提供了國際關係知識論的基礎，因爲「複雜」是可跨越物理系統與社會系統觀察的現象，並且複雜理論所發展有關此現象的許多概念可以運用在全球（變遷）過程中。[70]當然，這樣全球（變遷）過程觀點正符合國際關係研究範圍及議題正逐漸從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擴張成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研究，[71]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擴張成全球政

註 [66]　Emilian Kavalski, “Waking IR from Its ‘Deep Newtonian Slumber,” *Millennium*, Vol. 41, No. 1（2012）, pp. 137~150.

註 [67]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Of Parts and Who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Human,” *Millennium*, Vol. 41, No. 3（2013）, pp. 430~450.

註 [68]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London: Zed Books, 2011）.

註 [69]　Neil E. Harrison and J. David Singer, “Complexity is more than Systems Theory,”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25~41.

註 [70]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The Founda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omplexity of Foundation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42, No. 2（2012）, pp. 163~187.

註 [71]　參閱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enny Edkins and Maja Zehfuss, eds., *Global Politics: A New Introduction*（London: Routledge, 2009）

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72]然而，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引用複雜理論作爲國際系統理論化的途徑，尚難以評估其利弊得失。但 George Lawson 曾指出歷史社會學在本體論上是實存論、知識論上是關係論，以及方法論上是混雜的（promiscuous），[73]複雜理論是提倡關係式及程序式的思考、強調組織模式、網絡關係及歷史系絡，[74]引用複雜理論作爲國際系統理論化的途徑，似乎也是符合這三項要件。例如在本體論上，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認爲國際系統是獨立存在的社會事實，而且是鑲嵌在歷史過程中的社會事實。複雜理論則是認爲國際系統是鑲嵌在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歷史社會事實，國際系統是在開放的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下運作，尤其國際系統是個複雜系統，它是非線性、非機械及難預測的。運用複雜理論就必須注意國際系統是複雜的，而且秩序、失序與複雜性是共同存在及共同演化，具有不確定性及難預測性，是有其應用的優劣勢。[75]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運用複雜理論作爲國際系統理論化的途徑仍屬於少數、尚未普遍，主要是 Antoine Bousquet、Simon Curtis、Erika Cudworth 及 Stephen Hobden 等人，尤其 Stephen Hobden 是引導國際歷史社會學發展的一位重要學者，隨著複雜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此途徑應會逐漸獲得其他國際歷史社會學者的重視。

這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是否會引起新一波（第四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發展，尚難斷定，因爲其本身也只是剛剛萌芽而已，尚未發展成型。除了複雜理論本身難以理解之外，也涉及到國際關係學者如何將其運用於國際關係實務分析之上。畢竟這樣的非均衡系統觀點是不同於國際關係學者既有的學習、知識及能力，不免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學者加入此研究領域。

陸、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三階段國際系統觀點的異同

綜合上述，針對國際系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理論化及賦予歷史性而言，國際關

註[72]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73] George Laws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2007）, pp. 357~360.

註[74]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註[75]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p. 435~454; David C. Earnest and James N. Rosenau, "Signify Nothing? What Complex Systems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Global Politic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pp. 143~163.

係歷史社會學三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從傳統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而到複雜理論，顯示出其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的脈絡性。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是延續著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脈絡，即是從社會學傳統的歷史社會學、新韋伯派的歷史社會學而到新托洛斯基派歷史社會學爲發展。差異的是第三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則脫離了均衡系統理論，而是以非均衡系統的複雜理論，以非線性的動態觀點理論化國際系統。這會不會產生第四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又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了。

就上述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三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綜整其比較表（如**表 2**）以利了解三階段之間的差異。第一階段是以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爲國際系統理論基礎，強調在國際系統內的國家自主性與能力，也就遭受到忽略國際系統理論化的批評，也就是重國家而輕國際。當然這些批評多是從歷史社會學領域延伸到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而來，例如上述 Hobden 和 Nexon 對 Skocpol、Tilly、Mann 及 Wallerstein 的評論及回應就是如此。

即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常探討的 Mann，在國際關係相關期刊的論文也仍是強調國家角色。[76]著名期刊 *Millennium* 就曾以 Mann 爲主題，探討其歷史社會學理論及其對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研究的貢獻；[77]他也不諱言表示，他是社會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最近趨勢相當不感興趣。[78]基本上，第一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國家發展社會學（Sociology of State Development）或國家社會學（Sociology of State），[79]或是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這只是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交會」，[80]這第一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是將國際系統視爲國家與戰爭之關係，這也只是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81]這都只是「交會」或「邂逅」而不是眞正的結合，第二波才能算是眞正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註 [76] Michael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o. 3 (1997), pp. 472~496.

註 [77] George Lawson,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477~485; George Lawson, “The Social Source of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487~508; Fred Halliday, “He Hasn’t Finished Yet: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Work of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09~516; John M. Hobson, “Eurocentrism and Neorealism in the ‘Fall of Mann’: Will the Real Mann Please Stand Up?,”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17~527; Linda Weiss, “Michael Mann, State Power, and the Two Logics of Globalisatio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29~539; Michael Mann,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pires and European Miracles: A Response,”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41~550.

註 [78] George Lawson, “The Social Source of Life, The Universal and Everything: A Conversion with Michael Mann,” p. 496.

註 [79] Tim Jacoby, “Method, Narrative, and Historiography in Michael Mann’s Sociology of State Develop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3 (2004), pp. 404~421.

註 [80] 余家哲、李政鴻，「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頁 127~152。

註 [81] 汪宏倫，「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頁 259~286。

表 2 三階段理論化國際系統比較表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歷程	第一波	第二、三波	第四波?
國際系統理論化學科及基礎	歷史社會學 國家系統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國際系統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國際複雜系統
系統理論觀	均衡系統	均衡系統	非均衡系統
國際系統性質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際系統；國家系統。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家系統，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社會系統；國際系統是歷史事實，國家是國際次系統；以全球結構取代國際系統。	後人類系統；國際系統是人類的歷史社會事實與是非人類因素選擇因素共同演化的結果；複雜的調適系統。
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關係	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分隔；以國內類比國際，偏重國內層次；國際系統先於國家。	國際與國內分隔是現代現象，兩者都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家、國內及國際空間三位一體的因果鏈關係。	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是自我組織、複雜調適的系統，國內系統與國際系統互惠因果相互組成。
環境、系統、結構與單元的組成作用	組成靜態的封閉線性穩定系統	組成多樣性的封閉線性穩定系統	組成動態的開放非線性不穩定系統
系統與結構的關係	結構鑲嵌在系統內	兩者動態關聯；行爲者的自我理解此關聯；	多重單元互動突現結構（模式）及系統
系統與單元的作用關係	系統決定單元	相互牽扯	多重單元互動突現具體化系統
結構與行爲主體的作用關係	結構制約行爲主體	相互組成及自主性	動態演化的相互組成
理論化缺失	重國家而輕國際	重互動而輕複雜	重複雜而輕具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二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學者主要是以 Halliday 爲代表，他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有決定性的動力，結合新韋伯學派與新馬克思學派的觀點重新概念化國家與國際系統，[82]帶動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觀點。上述 Hobson 的「由國際到國內再回到國際」空間三位一體的因果鏈關係，或國家是具有空間雙面特性的實體，就是源自 Halliday 的觀點。這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二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重視了國際系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但輕視了其歷史性與複雜性。Thierry Lapointe 和 Frederick Guillaume Dufour 就認爲第二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由於其方法論及本體論的基礎之限制，在解釋結構與系統變遷時，也未能避免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rism），其國家、國際及全球空間三位一體的觀點仍需要以歷史來檢視。[83]當然，Hobson 提議朝向「複雜的」國家理論，也就說明了其嘗試解

註[82] Benno Teschke, "Advance and Impetus in Fred Halliday's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Apprais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5（2011）, pp. 1087~1106.

註[83] Thierry Lapointe and Frederick Guillaume Dufour, "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Turn in IR: An Anatomy of Second Wave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2012）,

決國際系統時空的歷史性問題時，系統複雜性也就成爲值得關注的議題。延續這樣的論點，遂有「複雜理論」成爲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第三階段國際系統理論化觀點。然而，複雜理論運用在國際關係上，就必須重新關注其具體性，既然「複雜」又要如何界定單元、結構、系統、系統內、系統與系統、系統與環境等等概念呢？更別提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所強調的歷史性，要如何在「複雜」中再呈現歷史性呢？這是第三階段所必須處理與回應的問題，也是可能引發第四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的動力所在。

柒、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啟示與省思

哲學家 Isaiah Berlin 在**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s and The Foxes: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書中，參考希臘斷簡殘篇詩中有關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知道一件大事的隱喻，將知識份子區分成這兩個類型，刺蝟型對世界是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追求普遍的理解及解決；狐狸型對世界是有多元的看法，追求不同或相衝突的理解。[84]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 George Lawson 就模仿 Berlin 將歷史社會學者區分爲追求大理論（grand theory）、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及整體宏觀基礎的「刺蝟型或統合者」（lumpers），以及追求特定領域個體微觀研究的「狐狸型或分割者」（splitters），再加上兩者之間的「清掃者或抽象者」（sweepers or abstractors）及「詳述者或歷史者」（detailers or historians）而將許多歷史社會學者標記在四個象限之內，藉以說明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不僅是開放社會及研究綱領，更是一個志業（vocation）。[85]也就是鐘鼎山林各有天性，學者是依據其興趣各自選擇不同的理論化途徑或方法。這就涉及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發展中有關建立普遍理論的爭論，至今仍無定論。同樣地，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也是會面臨這樣的爭論，無論在發展其理論或是發展其理論化國際系統的途徑上。有必要以此觀點，檢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的方法論啓示與省思。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引入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此歷史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或領域一樣，面臨是否追求科學的因果解釋以建立普遍理論的爭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對於這樣的爭論也是重覆歷史社會學的爭論，即是科學理論研究架構與歷史研究架構的關係。[86]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則是較爲關注於歷史研究的架構，即是時空

---

pp. 97~121.

註 [84]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註 [85] George Laws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 pp. 343~368.

註 [86] Simon Curtis and Marjo Koivisto, "Toward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4（2010）, pp. 433~455.

長期變遷的研究架構並且是多元型式或模式，[87]在因果關係上也是主張多元因果的觀點，[88]也是不同於實證主義的因果性觀點，是機制解釋（mechanismic explanation），其目的不在解釋事件或現象，而是更能解釋歷史的形式與系絡。[89]這樣的觀點都是源自於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本身內部的爭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只是沿襲這樣的爭論而來，並沒有定論。

就歷史社會學而言，是以精確所處的時空理解社會結構和過程，並以時間表達社會結構變遷過程，強調以時間序列（temporal sequences）解釋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並著重有意義的行動與社會結構系絡的交互作用，以說明有意或無意的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強調社會變遷的特定類型社會結構與模式的特別形貌及各種不同形貌。[90]簡言之，歷史是行動與結構相互創造與包容而成，在歷史的結構和行動中，尋求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的因果理論。[91]即是在歷史解釋的特殊法則（idiographic law）與普遍理論的律理法則（nomothetic law）之間尋求因果理論或因果機制，藉由歷史建構理論而不是隨著理論建構歷史。歷史社會學者所言（因果）機制是指一組分隔的事件，在不同狀況下，以完全一致或幾乎相同方式改變特定元素之間的關係。[92]這樣的（歷史事件）因果機制解釋，是不同於實證主義的因果解釋。總之，歷史社會學者以普遍理論解釋歷史（普遍理論派藉由歷史事實建立普遍理論）、概念解釋歷史（解釋派關切發生了什麼歷史偶發性）及分析歷史偶然性中的因果規律（分析派關切爲什麼，建立歸納的解釋理論），作爲發展歷史社會學的策略。[93]解釋派與分析派多以歷史敘事結合路徑依賴、比較分析法及事件結構分析（event-structure analysis），進行小樣本的因果推論。[94]因爲當個案研究被建構成敘事時，因果解釋就不需要比較或通則化了，敘事提供了事件或行動的歷史因果連結路徑。[95]

註[87] John M. Hobson and George Lawson,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15~435.

註[88] Thierry Lapointe and Frederick Guillgume Dufour, “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Turn in IR: An Anatomy of Second Wave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97~121.

註[89] Simon Curtis and Marjo Koivisto, “Toward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 447.

註[90] Theda Skocpol, “Sociology’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註[91] Philips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6~108; Theda Skocpol, “Sociology’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p. 1~21.

註[92]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

註[93] Theda Skocpol, “Emerging Agenda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56~391.

註[94] Larry J. Griffin, “Narrative, Event-Structure Analysis,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No. 5（1993）, pp. 1094~1133; James Mahoney, “Strategies of Casual Inference in Small-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8, No. 2（2000）, pp. 387~424.

註[95] Peter Abell, “A Case for Cases: Comparative Narrative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38, No. 1（2009）, pp. 38~70.

基本上，歷史社會學是運用歷史文獻資料驗證通則性的因果理論或因果機制，但由於歷史文獻資料是屬於小樣本特性，每個歷史事件都是獨立的，必須從長時間的事件中尋求因果理論，即是建立普遍理論或機制解釋。如何驗證因果理論或因果機制，遂成爲歷史社會學的重要爭論之一，爭論是否需要以演繹邏輯方式建立普遍理論，或是以問題取向進行關係的、歷史的理論化。[96]主張建立普遍理論的學者認爲歷史社會學應該以理論爲導向，以普遍理論演繹出因果關係或因果解釋，因爲社會因果機制是不可觀察的，無法來自經驗觀察而自來自普遍理論，[97]其中理性抉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就是其中之一的普遍理論。[98]主張不建立普遍理論的學者認爲歷史社會學應該以問題爲導向，以歷史個案敘事歸納出關係解釋或網絡解釋。[99] Jack A. Goldstone 則以物理學說明根本沒有普遍理論，只有普遍的程度差異而已，認爲科學研究主要是問題導向。上述兩派的差別在於前者普遍定律或後者初始條件的前提（foregrounding）差異，無論是前者以理性抉擇理論爲普遍理論或是後者以路徑依賴偶發性（path-dependent contingencies）的敘事都是可能、有效的歷史解釋。[100] Terry Boswell 和 Cliff Brown 認爲這兩者爭議在普遍理論的範圍，即是敘事歸納通則化及普遍理論演繹理論化的範圍，可藉由賽局理論及質化比較分析法將兩者連結。[101]Craig Calhoun 也認爲在歷史社會學的因果解釋上，普遍理論與歷史敘事並不是互斥的。[102]也有學者嘗試結合普遍理論（理性抉擇理論）與敘事（路徑依賴）發展出分析歷史過程的因果解釋。[103]柯志明也認爲敘事可以豐富化社會科學解釋（即普遍理論），而社會科學可以分析性地

註[96] 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1（1991）, pp. 1~30; Craig Calhoun,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1998）, pp. 846~871; 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1998）, pp. 829~845.

註[97] 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1998）, p. 786.

註[98] 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pp. 1~30; 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Vol. 104, No. 3（1998）, pp. 785~816.

註[99] Margaret R. Somers, “Narrativ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5（1994）, pp. 605~650.

註[100] 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829~845;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3（2000）, pp. 507~548.

註[101] Terry Boswell and Cliff Brown, “The Scope of General Theory: Methods for Linking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Comparative History,” pp. 154~185.

註[102] Craig Calhoun,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1998）, pp. 846~871.

註[103] Nicholas Pedriana, “Rational Choice, Structural Context, and Increasing Returns: A Strategy for Analytic Narrativ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33, No. 3（2005）, pp. 349~382.

發展敘事的理解。⑭但 Charles Tilly 認爲最好暫時將通則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上，設定時空限制而與社會生活經驗連結；社會的演變過程是取決於路徑依賴而非普遍理論或通則。⑮這意味著是由學者決定其所要選擇的方式，並沒有定論。

了解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在追求普遍理論或歷史敘事的方法論爭論之後，以此觀點檢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三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是有助於發現其啓示及作出省思。首先，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在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過程中，主要是在釐清國家與國際系統的關係，以及國際系統的性質，沒有要建立普遍理論的意圖。當然，有些學者如第二階段的 Barry Buzan 和 Richard Little 的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即是希望在比較分析歷史上各國際體系（主要是帝國爲主）之外，也想藉由六面向（系統內單元（units）互動強度、地理位置、國際系統相對規模、互動類型、觀察的時間幅度、主要單元性質）的觀察，找出國際系統的歷史轉折點（turning point），就能發展出普遍理論。⑯這也就是上述 George Lawson 所言，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個開放的志業。

其次，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延續社會學歷史社會學主張歷史與因果解釋的多元性，其在國際系統理論化過程中，歷史敘事的歷史解釋也成爲連結歷史事件偶然性的重要方式，成爲更能解釋歷史形式與系絡的機制解釋，而不是實證主義所主張預測事件的因果解釋。這在理解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上是重要的，才不會誤解歷史因果解釋的意涵。

第三，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三階段是引用複雜系統理論，意圖更能解釋歷史形式與系絡的複雜性，但需要更多的歷史敘事呈現複雜理論的適應性。就目前推動此途徑的學者著作而言，仍聚焦於引入理論而欠缺理論運用，尤其是結合歷史敘事的個案研究。當然，這或許是因爲第三階段還在發展之中，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者尚未掌握複雜理論內容，尚無法以歷史敘事結合之故。但若是能結合，就有可能引發第四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第四，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國際系統觀點也涉及到全球系統，在全球系統中存在著多個、多元且多樣的國際系統，國際系統之間的時空關係（歷史過程）與社會結構（權力及認同等關係）是需要進一步的理論化。例如西方國家組成的西方國際系統與非西方國家組成的東方國際系統是共存於當前的全球系統，但兩者的時空形成、構成與發展迥然不同，相互之間的權力及認同關係也存有差異，尤其是兩者之間在此歷史過程與社會結構的相互影響，相互造就了對方的存在。舉例而言，當成吉思汗的中國國際系統沒有遇見羅馬帝國的國際系統，就沒有現代的西方國際系統；當現代的西方國際系統沒有遇見清朝的中國國際系統，也就沒有現代的中國國際系統。簡言之，各

註⑭ 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49~170。

註⑮ Charles Tilly, "Future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7, No. 5 (1988), pp. 703~712.

註⑯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際系統之間的歷史偶然性或機緣也是未來的議題。

最後，面對開放系統或不均衡系統的系統理論觀點，國際系統也就更爲複雜與困難，其本體論與知識論已經超越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既有的假定，已經不能再以實證主義看待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更是如此，它原以歷史解釋爲解釋，不以預測爲科學解釋之目的。如今，第三階段的國際系統理論化引入複雜理論必然也會發展出不同的歷史解釋觀點，可能會是第四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發展的契機了。

捌、結　論

理論化國際系統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基本議題，各國際關係理論皆必須提出其國際系統觀點，作爲其推理或推論的依據。理論化國際系統也是區別各理論異同的指標之一，各理論對於國際系統特質、組成及結構的不同假定，顯示出各理論的觀點差異。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邊緣的國際關係理論，強調國際系統的歷史社會性，歷經三階段的理論化國際系統進程，第一階段引述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學者的國際系統觀點，批判新現實主義的國際系統主張，並以此理論化國際系統。其聚焦在國際系絡或國際系統的國家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國際系統與國內系統之間的歷史社會關係，其國際系統觀點是以國家系統爲基礎，發展國家在此系統中的理論觀點，但假定了國際系統對國家的限制作用，致使輕視了應有的理論化國際系統。第二階段是強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本身的途徑，其理論化聚焦於國際系統及國家的歷史偶然性、系統結構與單元之間的多樣性或多層面性及與系統的動態關聯性，關注結構與行爲主體之間的相互組成及自主性，藉由歷史化國際系統說明國家系統是歷史社會事實，是人類社會歷史變遷過程的事實；以及運用系統論概念化與理論化國際系統，探索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性問題」，使其脫離歷史社會學以國家爲中心的觀點，而成爲強調國家、社會與國際系統互動及相互組成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第三階段運用「複雜理論」將國際系統視爲是鑲嵌在自然系統及社會系統之內的複雜調適系統，是相互鏈結、相互演化的系統，各系統之間複雜互動在適應複雜的環境，並且帶來各自系統及整個國際系統的變遷。國際系統不再是人類歷史社會的事實，而是涵蓋了非人類選擇的因素，國際系統是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共同演化的結果。這樣的國際系統觀點逐漸成型，但仍有待觀察，尤其是它會不會帶動第四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發展。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延續歷史社會學建立普遍理論的方法論爭論，或是對於歷史解釋與科學解釋之間的爭論，其所發展的因果關係、因果解釋或因果機制式不同於實證主義以預測爲目的的解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化國際系統歷經三階段而發展出不同的途徑，仍不離以普遍理論或歷史敘事或結合兩者爲方式，這使得其國際系統理論化在方法論上有所啓示與省思。

總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一樣，其內部也是充滿著各自不同的觀點，選擇不同的國際系統理論化途徑，不僅豐富了其理論觀點的多樣性，也凸

顯其重視歷史社會性及國際性的特點。這說明了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研究領域，仍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是能有助於理解國際系統的歷史與變遷，尤其是其第三階段的國際系統觀點正處於未定之天，充滿著機會之窗，可供後進研究者探索與挖掘知識。

* * *

(收件：103 年 1 月 13 日，接受：104 年 3 月 25 日)

An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Hsueh-Chen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Theor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s a critical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RT). Some IR scholars even thought that IRT is a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orization. Since the 1950s and 1960s, IR scholars began to theoriz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build a scientific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ies. Many scholars tried to propose approaches in theoriz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rough system theori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mong them,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SIR)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orization. During the first phase, scholars introduced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o theoriz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criticize neorealism's theorizing approach. It emphasized on form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s or systems, particularly the historical-social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domestic systems. Its systems-theorization perspective is based on the "systems of states" not on "inter-national systems".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the systems-theorization approach of HSIR was emphasized and the focus was on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states, diversities of structures and units, dynamic interconnectedness of systems, and mutual constitutions and autonomies of structures and agents. It replaced "international systems" with "global structures" or "world society". Recently, the third phase incorporated the complexity theory, that is, international systems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embedded in physical (natural, material) system and social (ideal) system, having characters of self-organization, nonlinear, open and

co-evolution, the actions of units reified the models（anarchy or hierarchy）and regularity（order）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orization of HSIR not only brought in multi-perspectives for IRT, but also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n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 Theory,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orizing

參 考 文 獻

余家哲、李政鴻，「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40 期（2009 年 6 月），頁 127~152。

汪宏倫，「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11 年），頁 259~286。

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49~170。

郭雪眞，「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63~64。

Abbott, Jason P. and Owen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Abell, Peter, "A Case for Cases: Comparative Narrative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38, No. 1（2009）, pp. 38~70.

Abrams, Philips, *Historical Sociolog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Albert, Mathias and Lena Hilkermeier,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Routledge, 2004）.

Albert, Mathias,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3~68.

Albert, Mathias and Lars-Erik Cederman, "Introduction: Systems Theorzing in IR,"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20.

Baylis, John,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Berlin, Isaiah,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Bhambra, Gurminder K.,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nected Histor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1（2010）, pp. 127~143.

Braumoeller, Bear F.,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58~191.

Boswell, Terry and Cliff Brown, "The Scope of General Theory: Methods for Linking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Comparative Histor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8, No. 2（1999）, pp. 154~185.

Bousquet, Antoine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22.

Calhoun, Craig,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 (1998), pp. 846~871.

Cederman, Lars-Erik,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27~157.

Cohen, Benjam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 *Millennium*, Vol. 39, No. 2 (2010), pp. 399~416.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2011).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The Founda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omplexity of Foundation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42, No. 2 (2012), pp. 163~187.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Of Parts and Who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Human," *Millennium*, Vol. 41, No. 3 (2013), pp. 430~450.

Curtis, Simon and Marjo Koivisto, "Toward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4 (2010), pp. 433~455.

Easton, David,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Earnest, David C. and James N. Rosenau, "Signify Nothing? What Complex Systems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Global Politic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3~163.

Edkins, Jenny and Maja Zehfuss, eds., *Global Politics: A New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Eulau, Heinz, ed., *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thertn, 1969).

Glenn, Joh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 Fusion of Marxism and Structural Re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 (2012), pp.

75~95.

Goldstone, Jack A.,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 (1998), pp. 829~845.

Griffin, Larry J., “Narrative, Event-Structure Analysis,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No. 5 (1993), pp. 1094~1133.

Halliday, Fred,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Agenda,” *Millennium*, Vol. 16, No. 2 (1987), pp. 215~230.

Halliday, Fred,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Halliday, Fred, “He Hasn’t Finished Yet: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Work of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09~516.

Hamati-Ataya, Inanna, “Behavioralism,” in Robert A. Denemark and Renée Marlin-Bennett, ed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Onlin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http://www.academia.edu/593814/Behavioralism>, 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3 日。

Harrison, Neil E. and J. David Singer, “Complexity is more than Systems Theory,”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25~41.

Hobson, John M.,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bson, John M.,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tate and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1988), pp. 284~320.

Hobson, John M.,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bson, John M., “What’s at Stake in ‘Br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13.

Hobson, John M., “Eurocentrism and Neorealism in the ‘Fall of Mann’: Will the Real Mann Please Stand Up?”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17~527.

Hobson, John M.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63~98.

Hobson, John M.,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414~430.

Hobson, John and George Lawson,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37, No. 2 (2008), pp. 415~435.

Hobden, Steph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Hobden, Stephen,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erspectives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2 (1999), pp. 263~266.

Hobden, Stephen, "You Can Choose Your Sociology but You can't Choose Your Relations: Tilly, Mann and Rel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p. 281~286.

Hobden, Steph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ackson, Robert and Georg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coby, Tim, "Method, Narrative, and Historiography in Michael Mann's Sociology of State Develop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3 (2004), pp. 404~421.

Jaeger, Hans-Martin,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a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69~96.

Jarvis, Anthony, "Societies, States, and Geopolitics: Challenges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3 (1989), pp. 281~293.

Kaplan, Morton A.,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Kavalski, Emilian,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p. 435~454.

Kavalski, Emilian, "Waking IR from Its 'Deep Newtonian Slumber," *Millennium*, Vol. 41, No. 1 (2012), pp. 137~150.

Kiser, Edga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1 (1991), pp. 1~30.

Kiser, Edga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 (1998), pp. 785~816.

Lapointe, Thierry and Frederick Guillaume Dufour, "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Turn in IR: An Anatomy of Second Wave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 (2012), pp. 97~121.

Lawson, George,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477~485.

Lawson, George, “The Social Source of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Mann,”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487~508.

Lawson, George, “Editors Introduction: Forum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341~342.

Lawson, George,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343~368.

Lawson, George, “The Eternal Divid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2 (2010), pp. 203~226.

Mahoney, James, “Strategies of Casual Inference in Small-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8, No. 2 (2000), pp. 387~424.

Mahoney, James,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3 (2000), pp. 507~548.

Mann, Michael,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Mann, Michael,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o. 3 (1997), pp. 472~496.

Mann, Michael,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pires and European Miracles: A Response,” *Millennium*, Vol. 34, No. 2 (2005), pp. 541~550.

Martin, Kamra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World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formation in Premodern Ir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07), pp. 419~433.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cCoy, Charles A. and John Playford, eds., *Apolitical Politics: A Critique of Behaviorali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7).

Nexon, Daniel, “Which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sponse to Stephen Hobden’s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p. 273~280.

Pedriana, Nicholas, “Rational Choice, Structural Context, and Increasing Returns: A Strategy for Analytic Narrativ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33, No. 3 (2005), pp. 349~382.

Pickel, Andres, “Rethinking Systems Theory: A Programmatic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37, No. 4 (2007), pp. 391~407.

Ravenhill, Joh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ioux, Sebastie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Recovering Sociohistorical Causality,”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4 (2009), pp. 585~604.

Rosenberg, Justin, “The International Imagination: IR Theory and ‘Classic Social Analysis’,” *Millennium*, Vol. 23, No. 1 (1994), pp. 85~108.

Rosenberg, Justin, *The Follies of Globalisation Theory*（London: Verso, 2000）.

Rosenberg, Justin,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2006）, pp. 307~340.

Schmidt, Brian C.,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kocpol, Theda, "Sociology'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1.

Skocpol, Theda, "Emerging Agenda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56~391.

Somers, Margaret R., "Narrativ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5（1994）, pp. 605~650.

Spruyt, Hendrik, *The Sovereign States and Its Competitor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pruyt, Hendrik,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 Anarchy as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4（1994）, pp. 527~557.

Spruyt, Hendrik,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1998）, pp. 340~353.

Stetter, Stephan, ed., *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World Society: Modern System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07）.

Teschke, Benno, "Advance and Impetus in Fred Halliday's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Apprais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5（2011）, pp. 1087~1106.

Teschke, Benno, "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lutism to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1（2002）, pp. 5~48.

Tilly, Charles,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Tilly, Charles, "Future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7, No. 5（1988）, pp. 703~712.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Weiss, Linda, "Michael Mann, State Power, and the Two Logics of Globalisation," *Millennium*, Vol. 34, No. 2（2005）, pp. 529~539.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